

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

夏 鼐

解放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工作，同其他科学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十年来我国空前的经济建设工作，到处发现了古代居住遗址和古墓，出土了许多重要的古物。这样便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到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是“为挖宝而考古”，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而是为了要阐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进行考古研究工作。不像解放以前那样只注意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我们已经更多地注意居住址的发掘，因为它能够更全面地提供关于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的研究资料。我们工作的规模扩大了，年青的考古干部也大量地培养出来了。现在正致力于组织工作，在全国的考古工作者的协作下，打算拟出全面性的计划和安排，以便提高工作的质量和理论水平。

去年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我们考古学界也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学术思想批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我们工作的发展速度。最近，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公布后，人心更是振奋。我们将更加鼓足干劲，努力继续跃进。

现在依照时代的先后，把十年来中国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成就中最重要的，简略地加以叙述。

显示原始社会初期的面貌

我们先从最古老的谈起。我们的国土上，早在五十万年前便有中国猿人居住着。1949年我们在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地点又开始继续工作了。发掘工作中，不仅发现了猿人化石的残片和大批动物化石，还继续发现了他们所创造的文化遗迹——石器和用火的痕迹。1958年初步完成了10万件左右的中国猿人石器的研究工作。中国南部在四川资阳、湖北长阳、广东曲江和广西柳江和来宾，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化石残片。这些化石虽比北京猿人为晚，但对于华南早期居民的研究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在山西和内蒙，都曾发现过旧石器。其中最重要的是1953年山西襄汾县丁村的发现。次年，进行了有系统的发掘，挖出了许多动物化石、3枚人齿和200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比北京人所用的较为进步。研究结果，已发表了正式报告。

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已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从前把旧石器和古生物化石等同看待，以为可单纯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处理。现在一般认识到这是研究人类原始社会的初期情况的一门学科，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虽可使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来进行研究，但基本的研究方法应该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由“自然科学的角度转变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的发展新方向，使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二者之间的一段空白，现在仍没有把它填补起来。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十年内在全国各处发现了2,000多新地点。但是仍没有找到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迹。因而对于我国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在这许多新发现的地点中，我们选择了几处做了发掘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西安半坡的遗址。1954—1957年在这里掘到了一个原始氏族社会的村落。有许多保存较好的住屋和陶器。村外隔着一道壕沟还有当时的墓地。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精美的彩陶器和石制工具，还发现了一个小罐盛着粟米。1958年在陕西宝鸡、华县和华阴，也都发掘过同类性质的村落和墓地。

新石器时代的资料积累得多了，我们现正把它们加以分类，研究它们的内容和互相关系，并想求出它们的时代先后次序。在黄河流域，我们知道带有光亮

* 关于1954年以前的考古学工作，可参阅“科学通报”1953年12月号中夏鼐“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

黑陶的龙山文化是比较带有采陶的仰韶文化为晚。前段所说的四个在陕西的遗址便是属于后者（即仰韶文化）。1956—1957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掘，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另有文化层，虽基本上带着龙山文化的特征，但没有典型的黑陶，并且还有些陶器承袭着仰韶文化的痕迹，可能是代表龙山文化的早期。在甘肃东部，1956—1958年的调查，发现了原始社会的遗址在370处以上，并且确定了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顺序是：仰韶——甘肃仰韶（即马家窑）——齐家。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大概是同时的，但是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解放以前，关于华南地区的古代原始社会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这十年中，由于发现了许多新遗址，并且发掘了几个，这里的原始社会的面貌，已逐渐显露出来了。长江流域，由湖北经安徽到江苏和浙江北部，文化遗存呈现了受到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有许多带有龙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在有些地方，还有与仰韶不同的采陶。重要的例子是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和江苏淮安青莲岗遗址。东南沿海由浙江东南部到福建、广东，包括江西和湖南，有一种带有印纹硬陶和有段石斧的文化。这种陶片在长江流域南部也曾发现，但在有地层重迭的地方，总是在上层，可见它的时代较晚。在另一些地方（包括江西等处），印纹硬陶层的下面，常有以印纹软泥陶为特征的，或以更早的黄褐（或红色）砂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层。华南地区新石器的晚期是和黄河流域的有文字记载的青铜器文化同时的。

这十年来，在国内边区也发现过许多古代原始社会的遗址。新疆继续发现了彩陶和石器共存的遗址。在内蒙古继续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可分为二期，早期的有时有彩陶共同出土，晚期的有陶鬲和红陶片；一部分已以农业为主，不过兼营畜牧和狩猎。东北的辽宁和吉林东部，它们的文化和内蒙古的细石器文化相类似。但是吉林省的主要文化是一种以磨制石器、砂质素面褐陶和石棺葬为特征的文化。吉林西南部的新石器文化，和朝鲜北部及苏联极东地区的相类似。黑龙江依兰倭肯哈达洞穴中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蹲坐屈肢葬是一种特殊的葬俗。在我国的西南部，我们在贵阳、广西、广东的西部和海南岛，都有以有肩石斧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云南滇池东岸发现的新石器遗址，都有大量的螺壳堆积层，出土物有手制细泥红陶和有肩石斧。云南剑川发现有水上村落的遗址，出土有谷物、渔具、陶器、石器和少量红铜器，可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些发现为今后关于少数

民族古代原始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1955年出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各种文化遗存的具体内容，以求弄清楚氏族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序列，彻底批判了安特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

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

我国在殷商朝代（公元前Ⅺ—Ⅹ世纪）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有文字和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1949年以前，关于殷代遗址，几乎只知道河南安阳一处。这十年中，我们不仅发现了许多殷代居住遗址和墓葬，并且发掘了好几处。发现的地区，除了河南省以外，还有它的四邻各省：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和安徽。这就扩大了我们对于殷代文化领域的观念。

其中最重要的新发现，是河南郑州的遗址。在这里曾发掘出来平民住宅、骨器和铜器的作坊，制陶器的窑址和一些墓葬。并且在二里岗和人民公园的重迭地层堆积中有早中晚三期的文化层，晚期的和安阳小屯出土物的时代相同。1956年在郑州洛达庙又发掘到殷代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岗早期的还要早一些。从前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和以安阳为代表的晚期殷商文化（约公元前1300—1027）二者之间留有一大段空缺。郑州的发现使这缺口逐渐缩小了。今后的考古发现一定可以把我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崩溃、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这一切都逐渐弄清楚。

甚至于在1928年便已开始科学发掘的河南安阳的殷代遗址，这十年来的发掘工作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1950年在殷代皇陵地区的发掘工作又继续进行，继续发现了以人殉葬的现象，一座大墓中出土了许多铜器、玉器、车马饰和一件雕刻虎纹的石磬。在安阳也发掘到一些贫乏的小墓，很清楚地表示出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的对比。而殉葬现象更可说明奴隶社会中奴隶们的悲惨的命运。1959年的发掘，挖到了制骨器和铸铜器的作坊，还在小屯遗址的西侧和南侧发现一道阔而深的濠沟，可能是这都城的防御工事。

关于西周时代（公元前Ⅹ—Ⅶ世纪）的遗存，这十年中发掘的虽不多，但它们仍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学术意义较大的是西安张家坡的发掘工作。这是在相传西周都城丰镐的地方。1955—1957年在这里发掘了5,000多平方米，发现房基、陶窑、窖穴和水井。出土物有陶片、石器、骨器、人骨和少量青铜

器。这些发现虽不惊人，但对于当时人民日常生活的情况却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们在这里还发掘了一百多座墓葬，也有以人殉葬的现象。又有4座车马坑，车子的原来形制和马匹的原来排列，都可以复原出来。西周初期的生产水平和社会生活，似乎和殷代晚期没有多大的差别。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争论之一。考古的新发现也许可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的新资料。

其他地方的墓葬发掘中，出土的随葬品比较丰富。最重要的是1954年在西安附近普渡村和江苏南部丹徒烟墩山的墓葬各一座，出土了年代明确的大量铜器。根据铜器上的铭文，可以确定前者是穆王时物（公元前10世纪），后者为成王时物（公元前11世纪）。两墓中都出土有釉陶的豆。制釉陶的技术是承袭殷代的，但已加改进，几乎达到原始瓷器的水平。这种釉陶的豆，在安徽屯溪和河南洛阳的同时代的墓中也曾发现过。这时期的精美的铜器群，在安徽屯溪、陕西郿县、河南的洛阳、上蔡和鲁山、山西的洪赵、石楼和长子、辽宁凌源（旧属热河省），也都曾出土过。

春秋时代（公元前Ⅷ—Ⅴ世纪）的遗存，发掘到的并不多，但常常很精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黄河三门峡水库地区的陕县上村岭的虢国墓地。1956—1957年一共掘过230多座墓，包括4座车马坑。其中38座墓都出土有铜器。铜器最多的一座达200余件，包括一件有“虢太子元徒戈”铭文的戈，也许便是这太子的墓。较大型的墓中，死者身上常带有鸡血石或玻璃制的珠子等组成的项链或镯子，又有玉耳环和其他的饰物。玻璃珠、青铜短剑和铜镜是首次在这样早的墓中出现。虢国是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的。这墓群的年代是公元前Ⅷ—Ⅶ世纪。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安徽寿县的蔡侯墓，时代是公元前Ⅴ世纪初期。墓中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达1,000件以上，包括编钟和列鼎等。其中有好几件铜器都有铭文，有些记载蔡国和楚国、吴国的关系的。

更为惊人的发现是1957年河南信阳的楚国木槨墓。这是长沙楚墓类型的墓，但规模较大。墓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木器和漆器，保存得很完好。其中一套13个成组的铜钟，大小各不相同，敲击时发出合乎乐律的声音。又有一个挂钟的架子和二枚钟槌，都是木制的。其余的木器和漆器还有镇墓兽、木俑、耳环、乐器（如瑟和鼓）等。许多有字的竹简和一个装有毛笔、笔筒、小刀和小锯的木盒，后者是修整竹简和书写之用的。由钟上的铭文推测，这墓大概是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

山西侯马的古城，可能便是这时晋国的都城新田的遗址。1957—1958年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城墙、建于土台上的宫殿遗址、铜器和骨器的作坊和陶窑。这城大概延续到战国时代仍有居民。另一座东周的城址，是在洛阳西郊发现的。1958年把城墙探勘得大致清楚了。它的周围约12公里，比后来缩小了的汉城大得多。城中也掘到过当时的住宅、陶窑、骨器作坊、道路等。东周时代的其他重要都城，如齐临淄、鲁曲阜、燕下都、赵邯郸等，我们也都做了调查工作。

对于两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郭沫若院长重编他的“金文丛考”（1954年出版）和增订“两周金文辞大系”（1957年出版）之外，还对于许多解放后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做了考释，又将解放后他所写的关于以马克思主义阐明殷周奴隶社会的几篇论文，编成“奴隶制时代”（1952年初版）。

铁器的使用和秦汉的封建王朝

战国时期（公元前Ⅴ—Ⅲ世纪）由于铁器发明后的普遍使用，因之生产力高涨，也形成了文化的高峰。铁工具如锄、犁铧、斧、刀等，这十年中在二十多处这时的遗存中发现，最有兴趣的是河北兴隆（旧属热河省）发现的铸有铭文的铁范，是用以翻铸生产工具的。

战国时的手工业制品如铜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都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天才。1951年以来的长沙发掘，和1950—1951年的辉县发掘，在墓葬中都会获得精美的东西，充分地表示了当时工艺的多样性和优越性。其他已发掘的重要的墓地，有山西长治、河北唐山、河南的陕县、郑州和洛阳、陕西西安等处。其中洛阳中州路一个东周墓群，共发掘260座。经过仔细分析研究，它们可分为7期。这对于今后东周遗物分期的工作，帮助很大。此外，1958年在江苏武进淹城发现了独木船、20余件印纹陶罐和一批奇特的铜器；在安徽寿县发现了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的鄂君启的错金铭文的铜节4枚。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后220年）的铁制工具，不但分布地区更广，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多样化。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已见于汉以前的以外，还有剪刀、环形柄刀、镊、火钳等。这表示冶铁技术已有所提高，并能更充分地利用铁的性能。1958年河南巩县发现一座西汉时代的炼铁遗址，发掘出来炼炉残迹、矿石

碎块和炼渣、儲藏有炼成的鉄块的坑、使用的工具和已制成的产品。

汉代的城市遗址，前面已提及过的在洛阳西郊所发掘的，是当时河南县的县城。城墙周围約5.2公里。在城内曾发现住房、粮倉、水井、石子路以及大量的陶片、碎瓦、鉄器、錢币和封泥。更重要的是西安附近的西汉都城长安城废址的发掘。●城墙周围达25公里。1957年发掘了四座城門，每座都有三道門洞，还留有当时的車轍。由于出土物可以知道它們是王莽末年战争时所焚燬的。据汉书所記，大約是公元22年。城南有十来座宗教性质的建筑。1957—1958年发掘了两座，1959年春又将另外4座加以部分发掘。現以1957年所掘的为例：中央一个木构建筑物，筑于圓形土台上；这圓土台又是在一正方形的土台基上，外繞以四边有門的围墙，再环繞以一周的水沟。1955年在辽阳发掘了一个农庄，发现了6家农舍，出土有农具和生活用品；又发现了陶窑和水井。这給我們以当时农村生活的一幅生动的图画。

至于汉代墓葬，这十年中发掘了好几千座，分布在全国各处。西汉初年的墓葬，如西安、洛阳、郑州和陕县所发掘到的，墓形和随葬品都和当地战国晚年的很相类似。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起，随葬品的改变很是明显，和汉以前的易加区别。考古工作者将大的墓羣中各墓排列出一个順序，改易了从前的紛乱不清的情况。值得特別一提的汉墓出土物有下列一些：长沙的金錠、有字竹簡、木車和木船的模型，洛阳的彩繪陶壺和谷物(稻、粟、高粱等)，广州的木船和陶船、陶屋和陶倉(有的下面有柱子支撑)等模型，輝县的塑造生动的陶制动物，河北望都和辽宁辽阳的墓中壁画，江苏徐州、陕西北部 and 山东沂南的画象石，四川的画象砖和水田及水池的陶制模型，陕县后村的鑲嵌松綠石的銅方壺和銅制的背部嵌有带斑紋大貝的臥鹿。

汉帝国的边区也沒有被忽視。四川的船棺葬，出土有带有图画式文字的特別形式的青銅兵器和半两錢，时代可以确定属于汉初，有些稍早。当为該时当地原住人民的文化。在內蒙和辽宁西部，鄂尔多斯式青銅器和西汉銅鏡在一些墓地中共同出土。这些墓地可能属于匈奴人和东胡人的。最重要的是云南晋宁石寨山的发掘。这里34座西汉墓中出土了四千多件器物，包括一顆刻有“滇王之印”四字的金印，9件銅制鼓形器，200多件从事于各种活动的銅俑，具有特別形式和花紋的青銅兵器和工具，鉄制的斧和劍、子母貝，以及西汉式的銅鏡、漆盒和錢币。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衰和 复兴——隋唐帝国

汉帝国和隋唐帝国的中間时期(Ⅲ—Ⅵ世紀)，大部分处于分裂状态中，社会比較紛乱。后汉时輸入的佛教，这时大为流行。佛教艺术的遺存，在这十年中也繼續有所发现。甘肃永靖炳灵寺和武威天梯山两处，发现了有石刻象和壁画的石窟寺。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址中掘出2,200多件石刻，时代由这时期下迄唐朝。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中发现100多件紅砂岩所刻成的佛象，有些非常精美，时代与前者相同。

这时期的墓中出土了一些艺术品和日常用品。大量的陶俑生动地表现出这时各种人物的具体形象。墓中也发现許多精美的早期瓷器，最早的到东吴赤烏十四年(251年)。在著名的越窑的故乡浙江省，发现了肖山上董窑址，是属于这时期的。江苏宜兴晉將軍周处(297年战死)的墓中，出土許多瓷器、銅器、金飾和金属带飾。这些带飾，有的是銀制的，有的是另一种合金制成。后者經化驗証明含鋁85%，这是很重要的发现。洛阳一座晉墓中有一长达千来字的墓碑，記載墓主徐美人(賈后乳母)曾參預291年的宮闈政变。1957年河南邓县一座南朝(約东晉至南齐)墓中，有繪彩的印模画象砖，壁画和陶俑。华南的各处墓中常有瓷器和銅鏡，并且常有紀年的墓砖可以确定时代。

隋文帝于583年由汉长安城迁都到城西南郊的一个新址，跟着盖起了許多建筑物。唐朝的各帝繼續有所兴建。这城的規模很大。城墙周围共达33.5公里。1957年将这城墙和它的城門勘查清楚。城的东北角有大明宮，是唐太宗于633年修的，后来成为唐朝皇帝經常居住的宮殿。1957年开始发掘这宮殿。它的围墙、主要的門、20多处的建筑物和御花园中的太液池，都被勘查出来，有些已加发掘。其中最重要的发掘是玄武門和麟德殿。前者有三个門道；后者有192个柱础，地上鋪砖石，建于一高起的土台上。1956年在这里附近曾发现过一个涂金的刻花銀盘和四个刻有“楊国忠”等姓名的銀錠。此外，在有名的兴庆宮，也做了一部分发掘。

隋唐墓葬出土了許多有兴趣的东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安附近的隋唐墓，有些带有精美的壁画。山西太原唐墓也有壁画，但不及西安的优美。1957年在西安的一座周宣楊皇后(入隋为乐平公主)的小外孙女李靜訓(608年卒)墓中，发现了陶俑、瓷器、金銀器、鑲宝石金飾、玻璃器和一枚波斯薩珊朝銀币。我們在

河南、陕西、山西、青海和新疆，发现了九十多枚萨珊朝银币；此外，在西安一座隋墓中又发现一枚查斯丁二世(565—578)的拜占庭金币。最近在新疆乌恰发现一处窖藏，有萨珊朝的和阿拉伯仿萨珊朝的银币达947枚之多。由于这些发现，可见当时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关系的活跃。唐代的陶俑，有些还带有三彩釉，多是很精美，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尤其是西安近郊唐墓中出土的更为出色。例如1956—1957年所发掘的独孤思敬等三座墓中所出土的，便是好例子。唐代瓷器窖址曾在华南发现几处。在南京发掘南唐二座皇陵(公元十世纪)，墓室结构华美，绘有色彩。这二墓虽然从前被盗掘过不止一处，但发现的随葬品仍有陶俑、瓷片和玉册残片等。

三门峡水库区曾在峡北的小山后面发现一道唐代所挖的运河，以躲开峡中的峻急的水道。这运河叫做“娘娘河”，也叫做“开元新河”。又在峡的北岸发现棧道。这是便于拉纤的船夫将运粮船拉过这峻急的水道。这里仍遗留有当年为铺设木板时插装支架而凿的孔眼。这棧道在唐以前当已开凿，但唐代显然曾加工重修。山岩上刻有许多铭刻，最早的到汉和帝和平元年(150年)。

1957—1958年的新疆考古队，调查了古城、古居住址和寺庙约127处(包括古城58座)。在庫車和馬耨，还在几个主要属于唐朝的地点，做了一些发掘工作。重要的出土物有壁画、佛象、谷物(小麦、粟、高粱)、铁器、陶片、写有古维吾尔文的木简和写有汉字的纸。东北在吉林敦化，发掘了唐代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八世纪)。在西南，1958年在云南巍山县发掘了一处南诏国的遗址。又1956年在广西明江右江两岸的宁明县花山等处，发现了许多古代崖壁画。它们是古代僮族的创作，年代可能早到唐代或宋代。

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宋和宋以后

宋代(X—XII世纪)的瓷器的精美是全世界闻名的。这十年中，在许多宋墓中发现了瓷器。我们还调查了或新发现了几处烧瓷器的窖址。河南白沙的宋墓中有表示墓主人地主生活的壁画。山西侯马发现一座金大安二年(1210)墓，墓壁上放置着雕刻成的五个演艺艺人在舞台上演剧。这和山西洪赵县明应王庙中元代戏

曲壁画，都是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很有价值的资料。

在内蒙古和东北各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许多辽代(X—XII世纪)契丹人的墓。出土物有金银制的面具、铜丝手套、鸡冠壶和契丹文字的墓碑。1959年又开始发掘辽代中京大名城废址。1954年在辽宁鞍山陶家屯发现了金、元时代的农家遗址一处，所遗留的遗迹和遗物，生动地显示了这时辽河流域的小农经济。

元代(1279—1368)的许多墓碑在福建泉州(马可波罗和许多阿拉伯作家所提及的刺桐城)发现。这些是和伊斯兰教、摩尼教、婆罗门教、聂斯脱里教(景教)和天主教有关的，其中有許多刻有非汉族的文字，如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拉丁文、塔米尔文和蒙古文。山东济南和陕西西安的元代墓中发现有大量陶俑，有些陶俑作蒙古人装束。1955年在安徽发现了一个窖藏，有102件金银器，包括筷子、碟、壶、碗、勺等食桌上用器，有的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由铭文知道这一批中有些是至顺4年(1333年)造的。

最后要提到的，也是最引起群众莫大兴趣的，是1958年北京附近明代万历皇帝(1573—1620)的陵墓的掘开。石筑的墓室，由进口处到后墙，长达87米，装有三重雕刻精美的石门，简直可以说是一座“地下宫殿”。随葬物大部分和1951年北京附近所发掘的明代妃嫔墓中的类似，但较之远为精美。另有一些随葬品是皇帝和皇后所专用的，例如皇冠、龙凤冠、龙袍、宝玺、谥册等。墓中的金银器和玉器，包括珠宝首饰和织花的丝织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个发掘曾拍成彩色电影，公开放映。这发掘使我们看到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同时使我们看到古代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未来的展望

总之，这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考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得非常起劲和顺利，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就。这篇简略的综述，使我们看出我们已有那一些新收获，同时还有那一些空白须要继续努力加以填充。对于这些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我们还须要作深入的综合的研究工作。我们满怀信心，在今后一个十年中，一定能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一个更为系统化的学科。